

抗日英雄朴正爱

读者肯定会发生疑问 怎么,《我看韩国》首先讲述这个人,其间有何内在联系?

“联系”是有的。因为我对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韩国(大韩民国)以及对韩半岛的认识,不是从历史课或地理课堂上知道的,而是最初从这个人的历史故事开始的。

在韩半岛,有许多英雄人物,古代的,现代的。但在我青少年时代,最先“接触”到的第一位英雄人物就是朴正爱女士。那是 1950 年的春天(我还不满 17 岁),我偶然间在图书馆里发现一本传记性的书,书名曰:《狱中十八年》。书中记述两位抗日英雄在日本军国主义监狱中的英勇事迹。一位是日本国的德田球一先生,一位就是朝鲜抗日英雄朴正爱女士。我记得这本书的故事都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是回忆录。该书究竟有几篇文章、几个人的传记,今天我已经记不清楚

了，但是，这两个人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

进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位“朝鲜人”，正是这位朴正爱女士。我记得，书中记述了她反日、抗日的英勇事迹，特别是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监狱中对她的残酷折磨，施以难以言状的法西斯酷刑。我记得最残忍的酷刑之一，是用竹扦子扎她的十个指尖。我读着读着，毛骨悚然。就是在如此残酷的狱刑面前，朴正爱女士英勇不屈。啊，真了不起，真是伟大的女性，伟大的英雄！我对她肃然起敬。我对这位“朝鲜人”、这位朝鲜抗日女英雄的崇敬心情，迄今仍然很深。

正是这位女英雄 使我“知道”了朝鲜半岛和“朝鲜人”。

朝鲜族学生动我情

自从朴正爱女士使我“知道”朝鲜人以后，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见过”朝鲜人。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只是从书本、报纸和其它新闻媒体中“了解”半岛和“朝鲜人”。

我最早“见到”的“朝鲜人”是中国的朝鲜族学生。那是 1960 年代初期，我为辽宁大学经济系学生授课。这个年级（1959——1964 年）的学生当中有两位朝鲜族青年。他们是金镇浩和朴成哲先生。这两位朝鲜族青年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勤奋好学，品行端正，成绩优良。后来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有所成就，一位成为出版社的总编辑，一位是小有名气的经济学教授。但是坦率地说，他们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朝鲜人”所特有的“民族性格”。所以，他们并没有给我突出的“朝鲜人”的印象。

我最早“见到”具有民族性格的“朝鲜人”还是在

1970 年代初期。

那是 1972 年，我在辽宁大学中文系任职。学生当中有一位朝鲜族学生，他就是金天一先生。他性格开朗，能歌善舞，是个乐天派。我很喜欢他，慢慢地和他有了频繁的接触。他家居丹东（昔称安东），父亲是汽车装配厂的技术工人，技术水平很高，伪满时代就是汽车修理工人。其祖父是一位朝鲜国籍的侨民，也住在他家。金天一先生陪我到他家作客，并按朝鲜族的方式款待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朝鲜人”的家，也是第一次品尝“朝鲜人”的美味佳肴。这个第一次，大大加深了我对“朝鲜人”的印象和认识。

从此，打开了我认识和了解“朝鲜人”的感性之门。从此，我的朝鲜族朋友越来越多，与他们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在中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当中，除了满族以外，我接触最多的就是朝鲜族人。交往多，了解就多，甚至他们的生活习惯还影响了我。朝鲜族朋友爱吃“泡菜”，他们制做的“泡菜”是汉族人所不及的。先是和他们共餐，品尝“泡菜”，后来他们给我送“泡菜”，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爱吃“泡菜”的习惯。吃狗肉、喝狗肉汤的习惯，也是朝鲜族朋友对我“培养”的结果，以致往往一到周末就跑到城郊朝鲜族人开的“狗肉馆”，大喝其狗肉汤。

“人间自有真情在”。在频繁的交往中，我和朝鲜

族朋友的感情日益加深。我有一个不过生日的习惯。我对我的母亲十分孝敬，但我从来没有主动为我母亲祝寿过生日。但是，唯独对朝鲜族朋友，我则主动登门为他们祝寿。1988 年，辽宁大学外语系金亨一教授 60 大寿，在职工食堂举办祝寿活动，我闻讯前往，带着中国名酒“茅台”向他祝贺 并与到会的朝鲜族男男女女一起歌舞，十分开心。

有了交往，就有了情。这不仅是对朝鲜族朋友的个人情 而且是我对这个民族的情 对“朝鲜人”和韩半岛的情！

“ 出访韩国 责任我负 ”

1988 年春末夏初，我在华盛顿与我校物理系朝鲜族教授千文甲博士相遇。他正在美国一间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经他介绍，我在华盛顿期间结识了几位美籍韩国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朝鲜人”。他们当中有物理学家、医学专家 还有一位牧师。

在这之前，我从书本和新闻媒体中已经“知道”了一些韩国（大韩民国）的情况。她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她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成果……但是，韩国的情况到底如何？韩国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与中国的“朝鲜族人”有何异同？

这些疑问，这种好奇之心，在我内心深处萌发了一种潜在的意识——“到韩国去看看”。

在千文甲教授陪同我与那几位韩国朋友相聚过程中，我发现他也有想去韩国的心情。但是他并不明说，

更不向我正式“申请”，只是不断地流露这种情绪。我当然理解他，因为我也有同样的心情，更何况，他是一位朝鲜族人、祖根就在半岛而又从未登过半岛的大门呢？

我同情他。我“动员”他。

他想去又不敢去。这是他的矛盾心理。我怎么说服、动员他去，他执意不肯明确表态。后来牵扯到政治责任来了。他反问我：“现在去韩国访问，出了事谁负责？”我当即回答：“有事我负责，你就去吧！”他还是摇头，似乎在说：“口说无凭，立字为证。”啊，他是要我的书面保证。在当时冷战格局尚未打破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在千文甲教授如此“逼迫”之下，我提笔一挥，写了八个大字并签了我的名字。那就是：

“出访韩国，责任我负”。

在这种情况下，千文甲教授坚定了访问韩国的决心，并实现了他的心愿。据他后来对我说，在我给了他书面保证之后，便立即到了大韩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进大使馆，他就自报“我是中国人，希望访问韩国”。使馆官员乍听一愣。中国人要求访韩？而且是在第三国提出申请。这在“当时”形势下，实属罕见。经过交谈之后，使馆官员理解了他的心愿，明白了他的请求，不久便给他签发了入境签证。

1988 年盛夏，千文甲教授从华盛顿飞到了久已向往的大韩民国。

千文甲教授不愧为自然科学家，深谋远虑，处事心细。我当年给他出示的保证书——“出访韩国 责任我负”时隔 8 年了，迄今还保存在他手中呢。

冷战结束了。历史老人对我特别宽厚。这个历史责任无须我负了！这是我个人的幸运，这不也是“我们大家”的幸运吗？

初到韩国不陌生

千文甲先生是中国辽宁大学第一位访问韩国的教授。

我引以自豪的是，在中国大陆 1075 所大学当中，我是第一位访问韩国的大学校长。

那是 1989 年春天，造访大韩民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9 年 4 月 10 日，以我为团长的一行七人代表团，从沈阳飞经香港，当天傍晚抵达汉城金浦机场。在冷战格局尚未打破，中韩之间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从沈阳到汉城，差不多“走行”了整整一天。而如今，同样“路程”只需一个多小时。冷战前后在“时空”观念上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变化呀！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锦绣江山”，心情怎能不激动呢？当坐机飞临济州岛上空时，我急切地隔窗眺望，十分兴奋，一日之疲劳，颓然消失。

这次访问的第一站是光云大学校。以曹武成总长（在韩国，综合大学校长称总长）为首的光云大学校师生，给了我这个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以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一进校门，就看到从楼顶端竖挂下来的巨幅欢迎标语，足有几十米长，上面写着：“欢迎中国辽宁大学校冯玉忠总长”。标语是白布蓝字，庄重醒目，显示着主人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光云大学校以高水平的电子专业而著称于韩国教育界。该大学校是曹武成总长的家父创办的私立学校。其家父曹光云（又名花岛）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电子专业。学业完成后，回国创办电子产业，经营有道，发了大财，立志把自己的大部分资产投向教育事业，创建光云学园，并以“一条龙”的规划——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还亲自制定了校训。据介绍，曹老先生创办学校完全属于救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选择电子专业则出于“技术救国”之志。爱国、救国的崇高精神，是他钻研技术、勤奋经营的巨大动力，也是他学有所成、企业成功的力量源泉。企业经营和技术发展，使他想到了教育乃救国之本，于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家资无偿地投向了培养人才的摇篮。曹光云先生的这种崇高的教育救国思想和他那具有特色的办学宗旨，令我肃然起敬。出于内心深处的崇敬之情和东方人的礼仪，我到曹光云先生的墓地敬献了

鲜花并行了鞠躬礼。就是他，在我刚刚踏上韩国的土地 就给了我‘韩国人重视教育’的第一例证。

首次到访，为期两周，活动日程紧凑而又紧张。汉城、大田、春川 走访学校、学社、学术团体和政府机关。与各界和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大学主管、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国会议员、青年学生以及企业社长等等，数以百计。十几天的走马观花，所见、所闻和所感，令我终生难忘。

在此之前，我多次出访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家。所到之处 种族、文化、民俗、语言等等 使我有一种陌生感，总觉得我是身在异国为异客。但是，唯有“这次”到韩国 没有使我产生丝毫的文化反差感 不觉得陌生，甚至不觉得我是“在外国”。这种感觉和感受是怎样产生的呢？走访一周之后 我便“找到”了答案：啊 这是因为“我们”与韩国“太近”了 就是说 中国与韩国之间最突出、最明显的特点，一个字——“近”。

历史近；

文化近；

地理近；

感情近。

这“四近”是我首度访韩的最强烈的感受，也是我此后几年来放弃出访他国的机会，而频繁地奔波于半岛南北端的‘动力’所在。

这“四近”是我首次访韩归国后四处演讲的重要题材，同时也是向我国政府提供中韩关系决策咨询的重要依据。

这“四近”还促使我调整了本人科研计划和写作内容的比例。七年来我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韩国和半岛的文章几乎占我同期发表文章的一半。

这“四近”更使我和我的同仁们共同商定，丰富了辽宁大学的专业结构，创设了在中国闻所未闻的新专业——“韩国学”。在中国，按照国别设置专业和系科，还没有先例，而今却有了“韩国学”和“韩国学系”。这是“四近”的产物，也是“四近”的象征。

总之，这“四近”对我本人和对我的大学的影响，深远而又深远……

到处充满“中国热”

中韩两国之间的“四近”是我们两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韩两国携手跨进 21 世纪的坚实基础和宝贵财富。

这“四近”当中，最具现实意义、最令人感动的是“感情近”。

亲情、亲切、亲热。这“三亲”构成了一股强烈的、足以令世人瞩目的“中国热”。这是“感情近”的突出表现和突出明证。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五股“中国热”流。这就是：

- 对待中国客人热；
- 学习中国语言热；
- 恢复中韩关系热；
- 发展中韩经贸热；
- 青年留学中国热。

无论走到哪里，工厂、农村、学校或政府机关，只要是中国人前来造访，主人就十分热情地欢迎，破格、破例地接待。见面时那种亲热劲儿，真使人有久别重逢之感。在我下榻的宾馆，前来拜访者也是络绎不绝，天天深夜十二点乃至凌晨一、二点钟，仍有韩国朋友同我促膝侃谈。他们关心中国，但又不了解中国，他们迫切想“知道”中国的一切。这使我想到了，中韩两国之间既有“近”的特点，也有“远”的一面。因为，到底是隔绝了四十多年，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往来。这使我增强了扩大中韩两国之间人员交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只有交往，才能了解；多交往多了解，才能发挥我们两国之间“近”的优势。

韩国人学习中国语的热情，最能体现出他们了解中国和扩大同中国交往的紧迫感。据介绍，当时全国学习中国语的人大约有八千之众。他们以各种方式学汉语，正规的大学中文系，非正规的汉语补习班或中国语学院。一个仅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国家，竟有近万人专攻中国语。在 1980 年代能够出现这种局面，既是韩国人的“中国热”的象征，也是韩国人“先见之明”的表现。几年后的今天，那些汉语学习者不是有“用武之地”了吗？

在我所见到的韩国各界人士中，无一例外地倾诉了早日恢复中韩外交关系的紧迫心情。扩大人员交往

和经济文化交流，关键是两国之间正式建交。非此，还是隔绝状态；非此，还是互不了解。一位朋友颇有风趣地对我说：“本来很近，沈阳至汉城飞行一小时就到，可是这次你来汉城要走一天吧？”早日建交，既是韩国人的愿望，也是中国人的期望。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1992年，中韩两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从沈阳飞抵汉城仅七十分钟。我们之间“近”的特征终于体现出来了！

在工商界，想发展中韩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大有人在。他们“知道”或预感到中国这个大市场对韩国的重大意义。在当时（1980年代）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很少，至于韩商在大陆投资几乎等于零。汉城和大田市工商界邀请我座谈、演讲，我便介绍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改革进展情况和辽宁省投资环境。这些，深受韩国工商界的欢迎。两国之间“近”的“物质效应”主要还在于双方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这个愿望，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也实现了。如今，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在我看来，这还仅仅是开始，“大头”还在后头呢！

韩国青年学习汉语热，还表现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想到中国留学。在我初访韩国的两周时间里，数以百计的韩国青年向我“申请”到辽宁大学留学或求我帮助他们到其它大学攻读汉语课。在中国大陆，辽宁大

学接纳韩国留学生还是比较早的学校,1987 年我们就“秘密”地招收了韩国学生。不过当时是以“香港人”的身份对外公布的。这次访韩,使我深受启发,回国后,我们加大了招收韩国青年来校留学的工作力度,辽宁省和沈阳市有关部门,给予了积极配合。以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我们辽宁大学吸收韩国留学生,不仅时间最早,数量也最多。如今,在辽宁大学各院系就读的韩国学生已逾 200 人。

总之,首次访韩所感受到的“中国热”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使我联想了许多、许多……

在归国旅途中,我联想翩翩。想了我们两国间的“四近”,想了韩国朋友对我的亲情和“中国热”,甚至想了未来我们两国亲睦关系以及我们两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想着想着,即兴吟诵了一首打油诗:

锦绣江山美如画,
“小龙”腾飞傲东亚;
“三亲”“四近”中国热,
唇齿相依不排他。

爱憎分明的民族意识

韩国人民是爱憎分明的伟大民族。

韩国人民又是图强自立、极具警惕性的坚强民族。

当我首次到访大韩民国，在我所见、所闻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和各阶层人士中，给我最强烈、最深刻的印象。除了前述“四近”之外，还有一项，就是韩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在我后来的多次到访和频繁接触过程中，这一印象不断地加深。

—

从“物质生活方式”上看他们的民族意识。

在汉城，汽车之多，令我瞠目。据说，如果把京畿道计算在内，汉城地区拥有的汽车，大约是 350 万辆。几乎是三人一车。站在高层楼上眺望，各条街道上往